

# 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解释： 一项基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

管 玥\*

**【摘要】** 经验观察表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分布呈现出非匀质的特征：民众对中央政府较为信任，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则颇多不满。这一现象可以表述为“差序政府信任”。通过对 N 大学和 C 大学 1 000 名本科生的概率抽样，验证了调查对象对各级政府信任度层级递减的趋势，并从个体因素、制度安排、政治社会化三个维度初步建构了解释这一现象形成原因的理论框架。研究同时认为，作为联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普通民众的一种心理和治理结构，差序政府信任短期来看有利于合法性的维系，长远而言则未必如此。

**【关键词】** 政治信任 差序政府信任 信任差 央地关系 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2486 (2012) 02 - 0067 - 33

## 一、引言：从高政治信任谜题到差序政府信任格局

政治信任即民众对于政府能够根据他们的期望而运作的信念和信心。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资源和社会资本，高政治信任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和更从容的施政空间（相关述评如 Hetherington, 1998; Levi & Stoker, 2000;

---

\* 管玥，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本文改自作者 2011 年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感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孔繁斌教授、李永刚教授的指导。感谢李连江教授的意见。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Mishler & Rose, 1997; 熊美娟, 2010)<sup>①</sup>。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政府信任危机席卷全球, 重塑民众信任已然成为各国治理中必须直面的难题。

多项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 (或政治支持、合法性) 状况的实证研究则表明: 我国公民对政府的评价较为积极 (如 Chen, 2004; Gilley, 2008; Shi, 2008; Tang, 2005)<sup>②</sup>。一般认为, 民主国家通过竞争性选举等制度设计实现了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保证了较高的政治信任度。而在民主制度尚不健全的中国, 民意上达缺乏有效管道, 政府对民意的回应亦十分有限, 中国政府何以维系如此良好的民意基础? 对于这种规范与实证层面间的严重断裂, 学者们给出了社会经济绩效合法性、意识形态宣传动员、儒家传统文化等诸多回应 (如 Kennedy, 2009; Shi, 2001; Tong, 2011; Wang, 2005; Yang & Tang, 2010), 都有一定的解释效度。

与此同时, 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 尤其是互联网上常见的负面情绪表达又似乎表明, “我国公民较为信任政府” 式的一元化表述与经验观察并不相符。打破这种简约化思维的选择有三种取向。其一是对 “公民” 做类型划分, 如关注农民和市民、网民和非网民、社会强势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在政治信任上的分野。前文列举的研究多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质量控制较为严格, 不存在严

---

① 当然, 政治信任并非越高越好, 建立在对政府 “恶的假设” 基础之上的适度不信任也是民主政治的常态。这里还需对两组概念稍加澄清。本文中的 “政治信任” 与 “合法性” “政治支持” 都强调民众对政府积极、正面的态度和评价, 但它们的客体略有不同: 合法性是抽象的、政体层面的关切, 长期来看较为稳定; 政治信任、政治支持则更加宽泛, 既可以指向整体意义上的政体或政府, 又可以指向具体的某一级或某一个政府。同时, 政治信任属态度范畴, 而政治支持更具行为意涵。第二, “政府” 有广义狭义之分。考虑到转型国家的政治现实和民众的实际认知, 作为政治信任客体的 “政府” 这里取其广义, 指涉当代中国整套政治系统, 既包括党的系统, 又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系统。同理, 本文也没有对国家 (State)、政体 (Regime) 和政府 (Government) 作过于严格的界定。

② 唐文方 (Tang, 2005: Chap. 2)、墨宁 (Manion, 2010) 等就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技术手段及局限性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此外, 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些政治性民意调查结果本身存在怀疑。在他们看来, 中国公民可能出于政治恐惧而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陈捷 (Chen, 2004: 34-36) 和史天健 (Shi, 2001: 405-407) 分别通过计量分析表明, 政治恐惧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干扰, 但其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亦说明了这一点, 政治恐惧与对五级政府的平均信任度之间并无关联 (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0.041, 经双尾检验  $p$  值为 0.207)。当然, 这仍不足以证明调查对象没有给出策略性的回答。我们有理由对类似民意调查的结果保持一定的怀疑, 但不应全盘否定。

重的代表性偏差，但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它们几乎都未根据户籍等身份标识对“公民”进行更为细腻的划分。其二是对政治信任（或支持、合法性）做差别处理。例如，陈捷（Chen，2004）借用伊斯顿的政治支持理论，认为中国政府既不像西方学者想象的那样民意基础尽失，也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深得民心，中国政府拥有较高的散布型支持（Diffuse Support）和较低的特定型支持（Specific Support）。

更加细致的分析进路则强调对“政府”本身加以解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它至少包括两部分：上层的、抽象的、接触很少的和下层的、具体的、距离很近的政府。例如，王正绪（Wang，2005：114）提出了“想象政府”（Imagined State）和“实际政府”（Real State）的分野，在中国，享有高政治信任的是想象政府，而非实际政府；郭晓临（音译，Guo，2001：435-437）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农民眼中的中国政府由“仁慈中央”（Benign Central State）与“邪恶地方”（Malign Local State）共同构成；应星（2001；2011：149）也指出，民众眼中的国家形象可以概括为“闪着神奇光辉的中央+损公肥私的多数地方贪官+为民做主的少数清官”。明确提出此类观点的学者虽少，但拥有可信的实证调查的支持，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因而成为本研究跟进的目标。

事实上，诸如“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干部）是仇人”（张厚安、蒙桂兰，1993：42）之类的民谣也表明，民众眼中的“中国政府”绝非铁板一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sup>①</sup>的信任度差异明显。借鉴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提法，李连江（2012）把这一现象表述

---

<sup>①</sup> 中文语境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一对略带模糊性和情境性的概念，本文对它们的使用也是相对意义上的。“中央政府（中央）”一般指广义上的当代中国领导机构，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中央权威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但它有时也包括了省级政府，有时又与“国家”颇为类似。“地方政府（地方）”一般指中央以下的省级、市级、区县和乡镇四级政府，尤其是区县和乡镇两级基层政府。如前所述，本文无意陷入晦涩的术语之争，只期对该议题上的经验事实进行初步描述，并对其逻辑机制进行初步挖掘。

为“差序政府信任”（Hierarchical Trust in Government）<sup>①</sup>。

那么，这种“差序政府信任”究竟是民众的夸张表达，还是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它的真实存在？如果确实存在，它是如何发生、怎样流行的？又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政治意涵？这正是本文核心关切的议题。

## 二、文献述评

### （一）差序政府信任现象是否存在

前文列举了部分学者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的农民对央地政府的信任分殊。既往对当代中国差序政府信任的量化研究，尤其是全国性大样本研究较为有限。中国调查（China Survey）<sup>②</sup>抽取了全国73个县级行政单位（县/县级市/区）的近4000个样本，并发现：调查对象对中央领导的信任度明显高于省级和县级领导；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Wave One & Two）<sup>③</sup>也涉及亚洲多个国家（或地区）公民对央地政府的信任差异。两轮调查均显示：我国大陆公民更加信任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且其对央地政府的信任差值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当然，这些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研究并非以系统分析政治信任为目的，对“政府”的解构、对“公民”的类型学划分、对变量的测量都比较简单。本议题上更具学理性的讨论主要围绕地方性样本而展开。

一些学者就若干农村地区的政治信任状况进行了抽样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例如，李连江（Li，2004）的问卷调查表明：在1259名给出有效回答的

---

① 关于“差序政府信任”这一概念的来源及具体含义、既有研究积累及可资拓展的方向等，参见李连江（2012）。需要说明的是，李连江区分了“政府信任”和“政体信任（政制信任）”，“差序政府信任”不涉及政体、政制等抽象层面；而本文中的“政府”定义更为宽泛，并未严格划分“政府信任”和“政体信任”，后者类似于“合法性”。

② 中国调查（The China Survey）是一项由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人文学院（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t Texas A & M University）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开展的项目。哈梅尔教授（Robert Harmel）全权负责数据的发放工作。

③ 数据来源：<http://www.asianbarometer.org>。

受访者中，795人（63.1%）认为同较低级别党委相比较高级别党委更加值得信赖。胡荣（2007）的结论也与之类似，调查对象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任度自上而下逐级递减。但以上两项研究在问卷发放地点上相对局限，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缺乏关注（某种程度来说，这恰恰是更典型的中国农村）。这里，肖唐鏢、王欣（2010）新近的一篇论文尤其值得关注。通过过去十余年间在江西、江苏、山西、重庆、上海五省市60个村庄的四轮调查，他们在进一步验证政治信任逐级递减趋势的同时，初步纠正了地域代表性偏差，并打开了一扇观察农民政治信任长期变迁的窗口。此外，以上三项研究均就调查对象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进行了因子分析，提取了诸如“高层政府信任因子”和“基层政府信任因子”等分别加以研究。尽管分析方法和因子构成不尽相同，这在方法上已然给了后来者诸多启发。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两项对亚群体的研究。于建嵘（2010：219）对进京上访者的方便抽样发现：访民对五级政府的信任水平层级递减，央地之间落差极为明显。且很可能正是这种信任落差促使他们不惜代价地进京上访，以期“光荣而正确的中央”（应星，2001：331）能够了解地方政府恶行，为其主持公道。肖唐鏢（2005：27）则把目光投向了政府官员。通过对江西省委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学员（多为县处级）的问卷调查，他发现：这些基层公务员同样认为中央政府的公信力远高于基层。

其他政治态度方面的民意调查中，也有类似结论佐证民众对央地政府认同差异的存在。零点市场调查公司2003年起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研究》。这项业已形成多年积累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满意度很不相同，政府层级越低，满意度越低（Saich，2007：4；2011：202；零点指标数据网，2008）。这与政治信任的分布模式大致类似。

由此，本文回顾了若干学者在田野调查、全国性大样本研究、地方性概率样本研究和亚群体研究中观察到的“差序政府信任”现象。诚如李连江（2012：13）强调的那样，既往研究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积累，仍“不足以确证差序政府信任是否真实存在，更难确立差序政府信任在多大程度上普遍存在”，本文还是初步预设：“差序政府信任”现象在当代中国（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政府层级越低，所

获得的政治信任也越低，二者正相关。

那么，他国的情况如何呢？世界范围内，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差异十分普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998：15；2010：40-42）在全美开展多年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公民更加信赖（或满意）地方政府，州政府次之，中央政府最差<sup>①</sup>。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结论也与之类似（如 Chang & Chu，2008：101）。同样存在央地信任差异，但方向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有趣的比较政治学话题，并可能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尤其是央地关系和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二）差序政府信任现象何以形成

该议题上的描述性研究尚且充分，解释性研究则极为匮乏，且往往流于泛泛，未能就其形成（和强化）机制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上述文献均把“差序政府信任”或类似概念作为自变量而非因变量加以讨论。这里仅能找到两篇论文：刘晖（2007）从决策与执行的时空分离，及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不同应对出发，认为央地绩效差异经由公众心理这一路径而形成了“政府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叶敏、彭妍（2010）则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经济增长机制三个维度分析了“央强地弱”信任格局的成因。以上两篇论文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在理论挖掘（尤其是解释框架建构）上留有诸多空白；此外，受限于规范演绎的逻辑方法，若从实证角度来看，略显空泛。

尽管直接解释差序政府信任的文献极少，部分学者对政治信任的多视角讨论仍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学理支援。针对后共产主义国家政治信任的起源，有学者（Mishler & Rose，2001：31-37）曾建构了微观/宏观与制度/文化两维四分的解释框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中，微观制度视角关注公民个人对政府绩效的

---

<sup>①</sup> 美国其他一些调查（如 Cole & Kincaid，2000：197；Hibbing & Theiss - Morse，2002：100；Nye，1997：1）也得出了政府层级与政治信任负相关的结论。在回溯相关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弗雷德里克森（Frederickson，1997：187）从公共行政的视角出发，强调：美国公民更加信任离自己近政府官员，而认为离自己远的官员是懒惰低能，甚至很可能不诚实的，即“距离悖论”（Paradox of Distance）。

评价，微观文化视角强调个人的政治社会化经历；宏观制度视角关注外生的政府整体绩效，宏观文化视角强调内生的民族文化影响。然而，每一个公民独特的政治社会化经历与其对政府的绩效评判之间关系密切，难以截然二分；微观/宏观的提法本身语焉不详，可以有诸多不同的理解，用个体/社会来指代更加清晰；而以政府绩效、民族文化统摄宏观制度和宏观文化又有些狭窄，制度设计、治理传统等同样应容纳其中。因此，本文作了一些调整，试图从个体因素/制度安排/政治社会化三个维度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展开梳理<sup>①</sup>。

具体来说，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整体提升，但每个公民基于自身经历、社会境遇、价值偏好可能对政府做出迥然有别的判断。诸多学者讨论了人口统计因素（如性别、年龄、家庭经济情况等）以及政治因素（如政治面貌、政治效能感、是否曾遭受过政府的不公正对待等）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如 Chen, 2004; Li, 2004; 2008; Shi, 2001; 2008; Tang, 2005; Wang, 2005; 胡荣, 2007; 胡荣等, 2011）。一般认为，女性、中老年人、没有受到过政府不公正对待的社会既得利益者会给予政府更多的信任。当然，由于样本构成和统计方法运用上的差异，这些研究在结论上存在诸多矛盾之处。

另一些学者倾向于从制度因素上探寻答案。亨廷顿（Huntington, 1991: 50）、戴蒙德（Diamond, 1989: 35 - 39）等指出，尽管最终很可能陷入“政绩困局”，但提升政府绩效是几乎所有威权国家维系合法性的现实选择；而在黎安友（Nathan, 2003: 13 - 15）看来，近年来基层选举的深入、媒体管制的放开、人大独立性的提升等有效拓宽了普通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这些都对政治信任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还有少数学者从政治社会化切入，认为政治信任与传统文化、政治传播等息息相关。例如，儒家文化对政府“善”的价值预设和对政府责任的独特理解（如

---

<sup>①</sup> 本文从这三个视角分别展开讨论，但它们之间绝非截然分立，例如，政治传播既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安排的产物，而诸多个体变量的影响又内生于宏观制度和文化环境之中。还要说明的是，第一，尽管政治信任属于广义上的政治文化范畴，它和这里作为解释视角的文化路径并不冲突。史天健（Shi, 2001: 402）即指出，不能把态度、信念意义上的“政治信任”混同于价值、规范层面上的“政治文化”。第二，后文的讨论会偏重于制度层面。

Tong, 2011)、威权国家对媒体的控制(如 Kennedy, 2009)等,都与我国政府获得的高政治信任有一定关联。

### 三、研究思路与资料来源

沿着上述思路继续向纵深挺进,这里或许可以搭建起“差序政府信任”议题上的初步解释框架。

以个体因素而论,虽然当代中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已是基本常识,但对户籍(城镇/农村)、地域(东部/中西部)与政治信任关系的严谨实证讨论几乎是空白。是否可以假设中西部省份农民的央地信任差异更加显著?在人口统计因素之外,每个公民的价值偏好、政治社会化经历亦千差万别。是否可以假设,对政治新闻及网络政治讨论的关注、自己或家人曾经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对中国民主发展现状与政治制度架构的评判、与政府的频繁接触等不仅导致了政治信任的分殊,也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由于现有研究积累的薄弱,尚难猜测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以制度安排而论,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并存;多达五级的官僚科层结构设计使得委托代理链条时时处处可能发生扭曲,且央地政府间的权、责、利高度不对等,中央政府在事权、财权、人事权上均占据优势。是否可以假设,这种独特的制度安排是民众出现对央地政府信任差异的重要原因?

以政治社会化而论,崇拜中央与归罪地方的政治文化、异地为官传统下基层官员与当地民众信任纽带的断裂、近年来媒体管制适度放开对央地负面新闻传播的不同影响等,也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绝佳素材。是否可以假设,有利于中央政府掌控局面的治理文化与差序政府信任之间有着某种历史逻辑的关联?

概而言之,通过对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梳理,本文对差序政府信任形成(和强化)机制的讨论主要从如下三个视角展开(表1)。

表1 差序政府信任现象的解释框架

	个体层次	社会层次
制度路径	个体因素：人口统计因素（如户籍、地域），政治因素（如是否遭受过政府的不公正对待、关注政治新闻程度、对中国民主现状和制度架构的评判）	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如单一制、非竞争性选举），行政制度（如事权、财权、人事权在央地间的划分）
文化路径		政治社会化：如皇权崇拜等传统文 化，适度放松的舆论控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操作层面，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入口，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前述思考和假设。选择这一亚群体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差序政府信任”议题的学术讨论极为有限，且主要关注农民和上访者，尚未有研究者进入大学生中间，本研究希望以这样一个既不同于农民、市民，又兼具跨界特征且成长于不同省份的亚群体为切入点，关注常态政治而非抗争政治，通过局部探索性研究，尽可能丰富和完善理论框架，为后续研究的深入奠定基础、拓展思路；第二，在大学校园，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身份便利来保证概率抽样及跟踪调查的有效展开，并尽可能降低敏感度，收集高质量的一手资料，尤其是对同一群体的长期跟踪调查（Panel Study），这在既往研究中几乎是空白，又颇具学术价值；第三，作为社会运动的生力军和未来的精英群体，研判大学生的差序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及其短期波动、长期趋势，对分析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及其再生产机制的有效性、当前的政治稳定形势以及未来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资源等都有重要意义<sup>①</sup>。

综合考虑生源构成的代表性和问卷调查的可行性，本研究选择在 N 大学和 C 大学开展实地调查。N 大学是一所沿海地区的综合性大学，生源超过 60% 来自东部省份，且以城镇学生居多；C 大学是一所内陆地区的工科院校，生源超过 70%

<sup>①</sup>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就本研究的信度效度、代表性推广性等详加讨论。大致而言，大学（本科）生的特质包括受教育程度偏高（但又不算特别高）和年龄偏低。既往研究表明，以“受教育程度”而论，该亚群体更加信任政府；以“年龄”而论，他们在政治上又更为激进。对于大学生在“差序政府信任”上可能呈现出哪些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特点，这里无法妄加推测。本研究也期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总体尽可能地扩大。

来自中西部省份，且以农村学生居多。此外，考虑到新生对家乡政府的情况更为了解，以及长期跟踪调查的可行性，本轮调查在两校 2010 级本科生中展开。问卷样本的具体选择上，本研究采用概率抽样：在 N 大学，根据 2010 级本科生名册抽取 500 个样本进行填答；在 C 大学，根据 2010 级本科生宿舍抽取 500 间，每间宿舍中由访问人员随机选择 1 名学生进行填答。

本轮问卷的发放工作于 2010 年 10 月中旬完成，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971 份。总体而言，问卷质量较高，数据缺失较少。开放题“你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有什么看法？”的填答非常认真，因而积累了六万余字的文字资料以作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此外，还以当面访谈或电子邮件访谈的形式对具有一定代表性，且有回访意愿的约 30 名受访者进行了回访。

## 四、分析与讨论

### （一）统计描述

“差序政府信任”源于政治信任，其计量分析也应以对政治信任的测量为起点。受伊斯顿（Easton，1965）政治系统经典分类的影响，多数学者着力于在政治信任（或支持）的客体这一维上展开测量，如诺里斯（Norris，1999：16-21）即把之细化为共同体、政制、绩效、机构和领袖五个指标。然而，除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等跨国比较研究之外，以往中国场域的调查极少采用如此细致的分类。例如，中国调查（China Survey）、胡荣（2007）等都只考察了受访者对不同级别政府的信任分殊，这也切合民众的政治认知和研究的实际需要。另一条思路则是把“政治信任”本身分解为若干指标。史天健（Shi，2001）即在此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运用四个指标拟合了大陆和台湾民众的政治信任指数。这两条分类进路本身均颇具价值，但设若组合使用，则会给问卷填答带来诸多困难。在预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最终使用了一个指标（“你对家乡所在地（入学前常住地）中央/省级/市级/区县/

乡镇（街道办事处）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而非利用繁复的指标体系进行测量<sup>①</sup>。

图1为各级政府获得的政治信任均值及其95%的置信区间。由图可知，调查对象对五级政府的信任度确实逐级递减，且差异明显（各置信区间几乎不重合）。进一步的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任意两级政府之间的信任差异在统计意义上都是成立的（95%的置信度下，经双尾检验p值均为0.000）。此外，调查对象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较为一致（标准差较小），而政府层级越低，离散度就越高，这反映了他们评判基层政府时观点上的明显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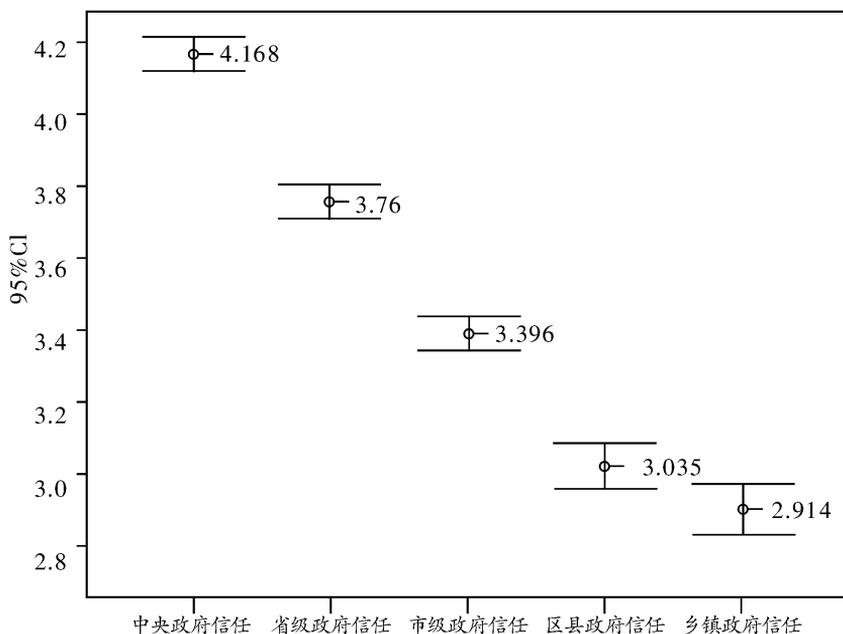


图1 对五级政府的信任均值

注：N=939，按列排除缺失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sup>①</sup> 选择“非常不信任”编码为“1”，“比较不信任”为“2”，“一般”为“3”，“比较信任”为“4”，“非常信任”为“5”。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街道办事处严格来说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但为了保证城镇和农村政府层级结构上的一致性（均为五级体系），这里把之作为一级政府来看待；第二，对于来自直辖市的学生，仅要求填答对中央/省级/区县/乡镇（街道办事处）四级政府的信任度。在实际分析中，其“市级政府信任”取“省级政府信任”，以减少数据缺失的影响。

借鉴两名美国学者就民众对体制内外政治精英信任差异的讨论 (Nilson & Nilson, 1980), 李连江 (2012: 13) 把“差序政府信任”操作化定义为“信任差” (Trust Differential), 但在具体计算方式的选择上则颇有争议<sup>①</sup>。这里姑且把之简单视为研究对象对中央政府和四级地方政府平均信任水平之间的差值。即:

信任差 = 中央政府信任 - (省级政府信任 + 市级政府信任 + 区县政府信任 + 乡镇政府信任) / 4

最终计算所得的信任差介于 -1.75 与 3.50 之间, 其均值为 0.892 (标准差为 0.789)。有 78.8% 的受访者认为中央政府较之地方政府更加值得信赖 (信任差 > 0), 15.3% 认为二者没有太大差别 (信任差 = 0), 仅有 5.9% 认为地方政府更加值得信赖 (信任差 < 0)。

## (二) 复合解释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本文试图从个体因素、制度安排、政治社会化三个差异显著但又相互联系的视角考察差序政府信任的形成 (和强化) 机制。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从大学生群体的差序政府信任现象切入, 但在解释框架的建构上又不拘囿于这一亚群体, 对其背后的深层制度、文化根源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也就是说, 下面的分析并非完全建立在质化和量化经验资料的基础之上。这种面面俱到的梳理难免

---

<sup>①</sup>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省、市、区县、乡镇四级为地方政府。但访谈发现, 省政府往往被认为是神秘而难以接触的, 农村学生尤其如此。也就是说, 以认知而论, 省政府在性质上更加类似于中央政府, 而非地方政府。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尝试突破央—地两分框架, 通过两项数据分析把“差序政府信任”界定为受访者对“高层政府” (Higher Level) 和“基层政府” (Lower Level) 信任度的差值。第一项分析源于一道多项选择题, 即“你认为以下哪些属于地方政府?” (在本问卷的语境中, 可以理解为“基层政府”)。结果显示, 仅有不到 30% 的学生把“省级政府”作为“地方政府”来看待, 比例明显低于“市级政府”“区县政府”和“乡镇政府”。另一项数据处理以因子分析的形式进行 (参见 Li, 2004: 254)。初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 当五级政府信任全部载荷到一个因子上时, 只能解释 59.9% 的方差, 但使用双因子模型时, 累积方差贡献率可达 81.0%。验证性因子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则发现, 当把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信任载荷到“高层政府信任因子”上, 把市级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信任载荷到“基层政府信任因子”上时, 该模型整体拟合情况最佳。以上三条“差序政府信任”操作化思路分别基于官方定义、民众认知和计量分析, 学理上都是可行的, 但后两种方法不甚成熟, 留待后续研究推进。本文使用传统的央—地两分框架。

泛泛，但作为该议题上的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希望初步搭建一个多维度、多视角的分析框架，尽可能形成一些可供检验的假设和命题；并以此为起点，在后续研究中致力于若干相对明确清晰且具有一定学理价值的因果机制的挖掘。

### 1. 个体因素

如前所述，个体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人口统计因素和政治因素（变量描述、编码方式、描述统计见附表）。考虑到很难脱离“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来单独理解“差序政府信任”，这里在把“信任差”作为因变量的同时，也给出了“平均信任”“中央信任”“地方信任”三个模型以作参照<sup>①</sup>。由表2可知，控制变量后，来自中西部省份及农村、自己或家人曾经遭受过政府的不公正对待、对当代中国整套政治制度比较满意但对民主实施情况相对不满、与基层政府（市级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接触较多但与高层政府（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接触较少的学生，信任差更大。

表2 个体因素的作用

	信任差	平均信任	中央信任	地方信任
常数	0.420*** (0.155)	2.664*** (0.123)	-0.930* (0.562)	-1.339*** (0.460)
人口统计因素：				
地域 (中西部=1)	0.178*** (0.054)	-0.092** (0.043)	-0.043 (0.224)	-0.425*** (0.160)
户籍 (农村=1)	0.121** (0.061)	-0.051 (0.048)	0.201 (0.261)	-0.180 (0.180)
控制变量：				
性别 (男=1)	0.151*** (0.057)	0.013 (0.045)	0.022 (0.239)	-0.129 (0.170)

① “信任差”和“平均信任”模型均使用一般线性回归分析。由于“中央信任”只设五个测量等级，不符合线性回归基本假设，这里适当变通，把之转换为二分变量以用logistic回归模型加以考察。其中，“非常信任”“比较信任”编码为“1”（N=773）；“一般”“比较不信任”“非常不信任”为“0”（N=122）。虽然“地方信任”（即对四级地方政府的平均信任度）有超过10个取值，为了保证央地模型间的一致性，这里同样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其值大于3时编码为“1”（N=529），反之为“0”（N=366）。尤需指出的是，限于实际数据结构，这四个模型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回归方法，因而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

(续表)

	信任差	平均信任	中央信任	地方信任
专业 (人文社科=1)	0.024 (0.061)	0.003 (0.048)	0.091 (0.253)	-0.107 (0.180)
家庭经济 (偏好=1)	-0.093 (0.064)	0.063 (0.050)	0.036 (0.266)	0.234 (0.184)
生活改善 (有=1)	0.036 (0.061)	0.049 (0.048)	0.157 (0.242)	0.146 (0.179)
社会信任 (偏高=1)	-0.113** (0.055)	0.145*** (0.044)	0.109 (0.222)	0.469*** (0.159)
政治因素:				
政治新闻关注(偏高=1)	0.028 (0.075)	0.003 (0.059)	-0.014 (0.307)	0.190 (0.219)
网络政治关注 (有=1)	-0.062 (0.056)	0.021 (0.044)	-0.335 (0.239)	0.105 (0.165)
不公正对待 (有=1)	0.235*** (0.066)	-0.248*** (0.052)	-0.018 (0.264)	-0.629*** (0.187)
制度满意 (偏高=1)	0.159** (0.073)	0.221*** (0.058)	1.159*** (0.259)	0.782*** (0.208)
民主满意 (偏高=1)	-0.110* (0.059)	0.303*** (0.047)	0.345 (0.254)	0.760*** (0.168)
基层接触				
接触过,但很有限	0.108 (0.073)	0.037 (0.058)	0.934*** (0.267)	0.174 (0.213)
经常接触	0.203** (0.100)	0.086 (0.079)	1.224*** (0.403)	0.162 (0.294)
高层接触				
接触过,但很有限	-0.206*** (0.079)	0.068 (0.063)	-0.469 (0.310)	0.277 (0.242)
经常接触	-0.272 (0.186)	0.076 (0.147)	-0.165 (0.826)	-0.131 (0.562)
控制变量:				
入党意愿 (有=1)	0.065 (0.067)	0.090* (0.053)	0.339 (0.247)	0.146 (0.196)

(续表)

	信任差	平均信任	中央信任	地方信任
国家自豪 (偏高=1)	0.116 (0.111)	0.246*** (0.088)	0.829** (0.336)	0.243 (0.328)
政治效能 (偏高=1)	0.027 (0.056)	0.010 (0.044)	0.041 (0.226)	0.092 (0.164)
政治恐惧 (有=1)	-0.016 (0.051)	0.016 (0.040)	-0.074 (0.212)	-0.258* (0.151)
Adjusted R <sup>2</sup> /Nagelkerke R <sup>2</sup>	0.096	0.216	0.170	0.210

注：a. “信任差”和“平均信任”模型采用一般线性回归，“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模型采用 logistic 回归。单元格中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或 logistic 回归系数(B)，括号内为标准误(Standard Error)，各模型均包含常数项。

b. N=895，按列排除缺失值，\*\*\*：p<0.01，\*\*：p<0.05，\*：p<0.1，双尾检验。

c. “基层接触”和“高层接触”的参照变量为“没有接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就各个因素逐一展开讨论。但初步的回归分析已然提供了诸多有趣且富有学理价值的线索。例如：①信任差与平均信任、中央信任、地方信任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方向并不相同(这一点在若干政治变量上尤为显著)，这是否表明“差序政府信任”与“政治信任”看似接近，但背后的形成(和强化)机制差异明显——差序政府信任内生于央地关系，而政治信任与社会化息息相关？②差序政府信任现象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且中西部省份更为明显，但进一步的分省分析发现，上海和重庆两地的学生更加信任省级政府(即直辖市政府)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否标示了当地治理的相对领先和社会福利的相对完善，甚或说地方主义的某种强化？③同样是政治接触，为什么研究对象与基层政府接触越多，对中央的信任越高，信任差也越大，而与中央、省的接触频率却与之负相关？这同样留待后续研究的深入，并再次印证了分析“中国政府”时破除整体主义取向的重要性(如 Diamant, 2001: 473; O'Brien & Li, 1999; O'Brien & Li, 2006: 51 - 54; Perry, 1994: 707 - 708; Shi & Cai, 2006: 329 - 330)。

尽管大学生本人与政府的直接接触较少，对政策的感知也相对薄弱，但考虑到其对外部世界的高度新鲜感和介入积极性，以及作为准成年人，也有较多机会

参与家庭事务和公共讨论，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本文认为，以上从研究对象个体异质性出发而得出的结论确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仍需接受更多且更严格的实证研究的检验<sup>①</sup>。

## 2. 制度安排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央地政府间独特的制度设计也是差序政府信任形成(和强化)的重要原因。

以政治制度而论，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上级授权，也处处受制于(直接)上级政府的政治领导和业务安排。竞争性选举的缺失进一步强化了官本位而非民本位取向的权力等级结构，是否积极回应辖区居民诉求对地方官员的仕途平顺与否并无直接影响。81.6%的调查对象赞同“地方政府更加关注上级政府，而非当地民众的要求”，比例相当之高。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利益逐渐分化，作为国家利益代理者的基层政权自利性不断膨胀，甚至出现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的转型(杨善华、苏红，2002)，偏离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既定目标。一旦民众的要求长期难以得到满足，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必然逐渐流失。

另一方面，尽管高度政治集权，幅员辽阔的地理格局、差异显著的区域发展现状、冗长的官僚科层链条又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控制和监管极为困难。大国治理的现实困境使得中央不得不通过与民众建立某些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渠道(如接待上访、委派工作组)来维护自身合法性，并制衡地方政府，从而紧密了其与普通民众的联系。而且，作为官僚科层金字塔顶端的中央政府吸纳了诸多政治资源(如对国家象征、国家仪式的垄断)，也便于自身良好形象

---

<sup>①</sup> 在当代中国经验研究中地方性概率样本的代表性和推广性问题上，墨宁(2004: 125)指出：“尽管我们不能依靠来自地区样本的数据沿着任何单一的维度去描述更大的总体，这种非代表性并不一定影响有关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本文的研究对象虽属亚群体，而非地方性样本，但其与全国性总体的差异同样是系统性的(Systematic)。因此，根据对变量之间关系的推断统计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如影响差序政府信任的诸多个体因素)仍可适度推广，而根据单一维度变量所得出的结论(如差序政府信任在调查对象中确实存在)与既有研究积累基本一致，也有一定效度。

的塑造(这一点后文还会提及)。地方政府对民众的回应缺失与中央政府对民众的亲合态度两相结合,加剧了政治信任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落差。

而以行政制度观之,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使得政府系统内部高度“职责同构”,“上下对口,左右对齐”(朱光磊、张志红,2005)。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宏观政策的制定,省、市政府主要进行再决策,并监督下级政府部门的落实,而执行的重担完全落在基层政府肩上,进而使其与民众接触频繁。一般而言,民众与地方政府的接触较多,对其较为熟悉,也相应较为信任。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普通公民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虽然接触广泛而直接,但经常是“恶性接触”(叶敏、彭妍,2010),形成负面的心理投射,反而导致信任下滑,之前的回归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在当前这种以中央集权和职责同构为特点的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1998)甚或说目标责任制(王汉生、王一鹤,2009)下,任务层层下压,指标级级加码。完成上级绩效目标的巨大压力促使基层政府向社会伸手,与民争利,再加上“身处前线”,很容易引发官民冲突,这同样加剧了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明晰了央地财权划分,但没有对全国性公共品和地方性公共品作出严格分界。改革后财权的不断上移,伴之以事权的不断下降,使得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陷入无钱做事的窘境。和20世纪80年代“分灶吃饭”体制下的“央弱地强”相反,分税制导致了财政收入“央强地弱”的倒挂格局,资源汲取机制向中央压地方、地方压民众的方向转移。沈荣华(2007)就比较了中国和美、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央地分配比例,并指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关乎民生的领域,中国的中央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基本公共服务政府间支出结构极不合理。财权事权的严重不对等使得中央政府很容易通过作出美好承诺来获取民众的支持,而地方政府承担着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重任,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完成。这种执行困境与中央政府所给予的强大执行压力共同作用,再加上自身的自利取向,地方政府的目标替代、行为扭曲屡见不鲜(如赵树凯,2003),这严重降低了民众对其的信任度。

此外，以人事晋升制度而论，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即实现了由“下管两级”向“下管一级”的过渡，中央政府仍掌握人事大权，并以此实现对地方的控制（如 Edin, 2003）。周黎安（2008）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仿佛处于一场处处与量化绩效指标相挂钩的“政治锦标赛”（Political Tournament）中，锦标赛的优胜者方有可能获得晋升机会。作为一种强激励的制度设计，它在保证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例如，地方官员出于理性人本性，更加关注 GDP 等可量化的经济考核指标，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教育、医疗等关乎社会民生但难以量化的指标。这种扭曲的政绩观势必积累民怨，加剧民众的不信任。而且，本文认为，获胜的基层官员层层晋升，进入更高一级的政策制定和监督机构；作为政策执行方的基层政府却成为锦标赛“失败者”和“新选手”的“集中营”和“训练场”，客观上导致了央地官员能力上的层级差异，并进一步加剧其政绩以及民众对其信任的差异。这也可以视为政治锦标赛的意外后果。

央地间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政治转型的“轴心问题”（吴国光、郑永年，1995），也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但受制于知识结构和生活视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很少注意到这一点。绝大多数学生倾向于把转型期的种种社会问题归罪于地方政府的执行不力。例如，509 号样本认为：“中央政策是好，但地方政府有种天高皇帝远的感觉，执行起来任意而为，更有甚者，拿钱不做事，上面政策成了永远的目标”；862 号样本则写道：“我认为中央还是好的，地方政府就有些问题。温总理曾经说过：‘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中央政府为了提高民生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地方执行时，政府却多少有意弱化。”这样的观点在开放题中十分常见。当然，也有个别受访者谈到：“或许地方政府的压力（在中国）大于中央政府，他们在新闻上的曝光度或许没有中央政府曝光度大，但却直接站在各种矛盾和不安定的面前”（318 号样本）；“中央只会画出个框框，让地方政府执行，没有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或有充足的资源去完成”（752 号样本）。从量化分析和访谈的整体情况来看，大学生对财权、事权的央地划分不尽了解，亦无法认识到央地政府间本身的紧张关系，只是对官员的能力差别有初步印象。例如，38.7% 的学生认为中

央政府官员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强于地方，多于认为地方强于中央的(31.6%)<sup>①</sup>。

当然，当代中国的政制设计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各项制度间相互包含、相互嵌套。以上政治与行政两分，事权、财权与人事权三分的解释逻辑仅是分析上的方便。

### 3. 政治社会化

首先，传统文化的积淀会形成路径依赖，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如Tong, 2011)。漫长的帝国统治使得“皇权崇拜”的观念根深蒂固，性善论、贤人治国、父爱主义国家的仁政理想也糅杂其中(康晓光, 200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命格局，被儒家“礼义伦理”的道德秩序包装，皇权并不直接表现为暴力垄断者的强悍面孔，而更多体现为父爱仁政的家长权威品格。它试图让民众相信，大家长是率先垂范的道德楷模，基层代理人可能作恶，但父母绝不会行凶。一旦出错，便祭出“经是好的，被和尚念歪了”的解释逻辑，经千年流转，逐渐融入到文化传统之中，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调查对象看来，一方面，“我相信中央大部分政策都是合理的、科学的、为了广大人民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想为人民服务，可能是由于大部分地方政府心贪，导致腐败影响了政府的形象”(518号样本)；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定期派干部到各县进行访查，并将其行踪通过媒体告知广大公民”(563号样本)，甚或说“地方政府欺上瞒下的行为太多，应该由中央秘密地在地方政府安排‘卧底’，把不好的官员全部除了”(595号样本)。面对频发的社会问题，大学生们对中央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主观动机)几乎未有怀疑，甚至寄希望于京官的“微服私访”。他们对中央政府很可能并不是现代契约意义上的信任，而是某种“信

<sup>①</sup> 让人更感意外也更有兴趣的是，58.6%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央政府官员为民服务的意愿强于地方，仅有6.2%认为恰恰相反(其余认为二者差异不大)。由此可见，在这些大学生眼中，央地官员能力上的差异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央地政府态度上的差异则极为明显。关于民众对央地政府能力和态度两个维度信任度分殊的讨论，见Li(2004: 238 - 239; 2008; forthcoming)。李连江进一步把“中央政府的能力”拆分为“知晓信息”和“解决问题”两个维度。与之类似，应星(2011: 153)通过对政治民谣的解构提出了民众对中央政策得不到落实的三重归因，即“远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力”，并指出，后两种情况在传统合法性话语体系中并不存在。本研究也发现，在“对于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出现的偏差(如暴力拆迁等)，你比较赞同以下哪种看法?”上，只有12.1%的学生相信中央政府“远而不知”，但他们对中央政府监督和控制能力(即是否“有能力纠正”)的判断很不一致。

仰”(李连江, 2012: 16)。这种对中央的强道德假设完全有别于西方的无赖假说。而归罪地方的治理传统与“必要的恶”仍差异明显, 人治大于法治, 扬善先于抑恶, 传统文化中对地方官的假设表述为“应该是好的, 但可能是坏的”似乎更为合适。

在从帝制传统、儒家教化出发对差序政府信任现象做出解释的同时, 本研究也试图为民众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继续寻找注脚。东汉即推行的“异地为官”有利于防止贪污腐败、结党营私乃至地方割据, 但这在客观上割裂了地方官员与当地民众的地缘纽带<sup>①</sup>。官员地域认同的丧失导致其道义责任的可能丧失, 诚如多位调查对象指出的那样, 地方官员并无热情为当地百姓谋福利; 民众亦难以建立起对外来的、临时的, 甚至很可能不会当地方言的“父母官”的基本信任。本研究曾经假设这一点在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更为明显, 但量化和质化资料都表明, 农村学生对裙带关系的厌恶更甚, 反而希望家乡行政首长是外地人。

其次, 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 大众传媒在政治事件的传导和放大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 因而可能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某种影响。一般认为, 在民主国家, 民众的媒体接触频率与政治信任负相关, 而在非民主国家, 媒体往往是政府塑造民意的工具, 二者正相关。学者们对当代中国媒体与政治信任关系的讨论莫衷一是(如 Chen & Shi, 2001; Kennedy, 2009; Lei, 2011; Stockmann & Gallagher, 2011), 但有一点是取得共识的: 近年来政府对地方性新闻的控制已经适度放开。唐文方就把中国的媒体管制比喻为一个倒扣的漏斗: 上紧下松(Tang, 2005: 99)。然而, 这种对地方性新闻政治控制的适度放开对央地政府形象的影响并不相同。市场化进程与管制弱化的共同作用使得媒体更加关注现实政治问题以吸引受众眼球, 保证市场份额, 诸多关于地方政府腐败等负面新闻的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频见诸报端。景跃进(2000)曾指出, “焦点访谈”等舆论监督节目对于中央政府的治理可谓一举多得。它既能传递地方上的真实情况, 减少信息失真, 又能监督和威慑地方政府, “杀鸡儆猴”; 更有甚者,

<sup>①</sup> 这里关心的是传统文化层面的“异地为官”所造成的民众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 而非与之相伴的“流官制度”所带来的激励扭曲(如地方官员对当地发展的不负责任, 追求短期政绩), 后者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考量。

在普通民众眼中，中央电视台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中央”的声音和态度，“焦点访谈”因而成为中央政府获取权威和合法性的重要治理技术。地方媒体的情况略有不同。他们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省域之间的行政权分立，实行异地舆论监督，从而适度规避了地方保护主义。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层面的管制依然严格，呈现出一番美丽图景<sup>①</sup>。本研究的调查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受访者认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其所报道的负面新闻绝大多数都是有关地方政府的(表3)。正如780号样本指出的那样：“中央的光辉形象塑造得还可以(不管是用什么手段)，让人比较安心”，这种媒体适度市场化过程中开放与管制并存的局面在加剧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同时，也进一步拉大了民众对央地政府的信任鸿沟。

当然，以上政治社会化层面的梳理远未完备。以治理传统而论，“皇权崇拜”“归罪地方”“异地为官”只是三个可能影响因素，治水传统、征税体系、革命动员、计划体制等方面都有可资挖掘的空间，而且，这些治理传统方面的假设近乎是万能的，或多或少面临无从证实或证伪的尴尬；近年来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批判型公民(Critical Citizen)(Norris, 1999)的成长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m)(Inglehart, 1977)的培育，进而有可能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某种影响。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的跟进。

表3 受访者眼中不同媒体负面新闻主要涉及政府层级的交叉表

	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	网络等新兴媒体
中央政府	56(5.8%)	148(15.4%)
地方政府	767(79.6%)	723(75.1%)
都比较少	140(14.5%)	92(9.6%)

注：N=963，按列排除缺失值，单元格中为频次，括号内为百分比，由于四舍五入误差，其和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sup>①</sup> 传统上，涉及中央政府(尤其是中央现任高层领导)的负面新闻是公认禁区。但近年来网络等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舆论监督的这种央地分野更趋复杂。尤其是2010年以来“微博问政”的兴起使得负面新闻报道越来越频繁地波及中央政府。

## 五、政治意涵

差序政府信任现象(一定程度上)的存在表明,民众心中实际作出了关心民生、形象高大的中央政府和忽视民情、弊端频现的地方政府的区隔,这种政治态度上的两分很可能对其政治行为产生某种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进而动摇其治理基础。早年的研究表明,政治不信任与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效能感)结合很容易诱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如 Guterbock & London, 1983; Paige, 1971);而与对中央政府的高信任结合,则可能触发或激化所谓的“合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O'Brien, 1996; O'Brien & Li, 2006)。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当前不断增强的反体制倾向和各地频发的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即是实例。

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民众仍把某些社会问题的失察或解决不力仅仅视为基层政府执行中的偏差,信任流失远未延及中央,体制内部依然拥有较为丰富的政治资源和运作空间。但高政治信任的现状绝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高枕无忧,一旦民众不断上升的诉求长期难以得到满足,中央政府所获得的政治信任有可能迅速下降,进而导致整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而上访等与中央政府的直接接触更会加速这种从对地方政府的不满到对中央政府的不满的转化。已有实证研究表明,进京上访会显著提高民众对中央政府不满的程度,而且,进京上访次数越多,对中央就越不信任(Li, 2008: 218-219)。

本文也尝试把这一议题置于更为宏观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借鉴拉卡托斯(Lakatos, 1978: 47-52)的“硬核(Hard Core)—保护带(Protective Belt)”比喻,可以将差序政府信任(某种程度上)视为转型国家维护合法性(硬核)的一种策略性支撑结构(保护带),通过一系列制度调适阻止(至少是延缓)了合法性危机的上移,保证了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部分实现了“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Nathan, 2003)。

具体来说,中国不仅拥有多达五级的庞大官僚科层体系,而且,不同层级政

府间存在功能性划分，中央通过治官来间接治民（曹正汉，2011；Cai，2008），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普通民众间的制度安排极为复杂。这样的政制设计一方面似乎无助于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度的维系。在如前所述的地方无法积极回应民意的现实困境中，中央政府可以把政策执行压力和与民众的接触机会下移，并在民怨较大时，将地方政府的自利视为有错，将失职的地方官员推出定罪，从而有效切割，捍卫“经是好的，被和尚念歪了”的民间共识。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化中的种种优势，以及与民众直接接触渠道的选择性开启权（如接待上访、下派工作组）不仅拉近了中央政府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提高了公信力，也便于与民结盟，制衡地方政府。其逻辑与革命年代的“群众路线”有一定的相似性。

由此，“差序政府信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转型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强化的一种心理和治理结构，作为合法性的保护带而顽强存在<sup>①</sup>。对基层的信任降低固然有诸多阻滞作用，但对中央的高信任已然为民心敞开了一扇更具吸引力的补救之门，在回应性严重不足的大背景下，反而舒缓了转型国家的内在紧张，保证了政治系统的高效运转。

但是，保护带并不是万能的。一方面，随着地方自主性和自利性的不断扩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变得愈发困难。中央向基层的施压似乎不仅没有实现处理公共事务能力的改善和为民服务意愿的提高这些既定目标，相反，基层政府之间存在广泛的“共谋现象”以应对“象征性强大国家”（周雪光，2008），甚至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倒逼机制，可以把包袱还给中央<sup>②</sup>。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尤其是东部省份和城镇地区的政府）对辖区民众的回应性已然改善，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认同度也相应有所提高。零点市场调查公司的长期跟踪研究表明，

---

① 尤需强调的是，尽管本文使用了诸如“策略”“塑造”之类的字眼，但很难说转型国家对差序政府信任的这种“强化”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多大程度上又是治理惯性的产物。大体而言，本文认为，差序政府信任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心理结构，根植于政治传统之中，并为转型国家所借鉴，演化为当代中国的一种治理结构，但又可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形变。限于篇幅和该问题上的复杂性，本文不再展开。

② 这在早年对农民负担、税费改革的研究和当下对维稳政治的讨论中多有涉及，本文同样不再深入。

2003—2007年间,我国民众对地方政府满意度的增幅明显大于对中央政府的(Saich, 2011: 202; 零点指标数据网, 2008)。与此同时,与中央接触的增多、对中央预期的提高、权利意识的勃兴、政治知识的成长等等,都可能导致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如 Li, 2004; 2008; forthcoming)。如若失去了民众对中央的高信任,而基层的现实又着实令人揪心,整个政治系统便会暴露在可怕的怨恨之中。也就是说,长期来看,作为转型国家合法性支撑结构(之一)的“差序政府信任”似乎并不能有效保护系统硬核,甚至可能加速硬核的破裂<sup>①</sup>。

## 六、结语

通过对 N 大学和 C 大学 2010 级本科生的抽样调查,本研究发现:①受访者对五级政府的信任水平逐级递减,这对既往主要针对农民和上访者展开的类似研究既是回应,又是扩展;②这一现象与个体因素有关,家乡所在区域、户籍、与基层和高层政府的接触频率、是否遭受过政府的不公正对待等都对其产生了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③这一现象与制度安排有关,既可以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等政治制度,又可以从央地政府间事权、财权、人事权的划分等行政制度出发予以解释;④这一现象与政治社会化有关,如皇权崇拜、归罪地方、异地为官等治理传统下的路径依赖,近年来媒体管制适度放开对央地政府形象塑

---

① “差序政府信任”是基于“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的学理建构,其动态含义和长期变迁较为复杂,这里倾向于从“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两条线索分别加以考察,而非强行合一。如前所述,政治信任有助于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但适度的不信任同样健康。本研究无意为“信任差”在数值上的增减附着过于浓厚的价值判断,只是认为:当代中国这种差序政府信任现象颇为特别,对其形成和变迁机制的研究也颇具意义。就其短期波动而言,本研究曾于 2009 年 5 月和 2010 年 6 月对 N 大学 200 名本科生开展过一轮跟踪调查,并发现:调查对象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在一年中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但信任差极为稳定。此外,在数值的大小考察之外(这里又涉及第四节的操作化困难),更具学理和现实价值的可能是对其不同模式(Pattern)的比较(李连江, 2012: 14):对五级政府的信任都很高(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理想型态)、对五级政府的信任都很低(如某些失败国家)、对中央的信任明显高于地方(如当代中国)、对地方的信任明显高于中央(如某些基层政府经民众直选产生且回应性较好的国家)。如果我国民众对中央的信任持续走低,而对地方的信任又并无显著改善,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整体不信任这一危险后果出现。

造的不同作用等。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中，中国这样一个民主化进程相对缓慢的中央集权大国如何寻求更具普世价值的合法性支撑，从而规避日益严重的系统性危机？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一个极具价值的谜题，吸引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努力探寻自己的答案。如前所述，早期的研究往往或是认为中国政府享有的高民意基础不过是宣传控制或政治恐惧的产物，或是强调经济绩效、传统文化等的作用。晚近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在背离经典政治学理论的情境中，中国政府已然通过制度调适，部分实现了威权韧性，甚或说形成新的合法性维系机制（如 Nathan, 2003；Schubert, 2008）。这可能是一条颇具解释力的理路，但相关研究仍显不足，对其背后机制的挖掘留有诸多空白。

以研究路径而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中心范式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逐渐复兴。若以经典的国家—社会两分法来分析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薄弱使得社会中心论的解释略显乏力。强国家的传统和现实之下，学界理应给予“国家”这一分析单位以足够的重视。但如前文指出的那样，把层级复杂、面孔参差的中国政府（国家）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主义思路大大制约了相关理论的适用性，必须予以适当解构。然而，现实的困境还在于，转型国家运作的封闭性与模糊性使得学者们对于这些国家的直接观察困难重重。如若把“民众”这一维度加入，或许可以适度规避这样的“黑箱困境”。这也暗合米格代尔（Migdal, 1994: 14-16）所提倡的“国家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在中国内地，一些学者即或有意或无意地以田野调查为入口，考察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普通农民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研究旨趣的差异甚或资料获取的困难，既往研究几乎都以相对可见的、激烈的农村抗争政治个案为入口，而本研究期待回归到较为温和，也更为重要的常态政治中来，以对民众政治态度、行为的测量、观察为基础，进一步打开“黑箱”，并在计量手段的帮助下融入更多地域、户籍方面的考量和历时性的年际比较成分。

也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本文把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的普通民众眼中的

“差序政府信任”<sup>①</sup>作为眺望中国政治的一个窗口，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为当代中国政府所获得的高信任度提供一种新的可能解释：转型国家在模糊的黑箱运作中把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作为屏障，通过不断调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普通民众三者之间的制度安排，构造出（甚或说强化了）一幅关系亲疏、距离远近交织的奇特图景。由此，中央政府对民众保持了威严与父爱，民众对中央政府产生了敬仰与依赖；中央对地方政府保持了适度的威慑和纠错，地方政府部分充当了政策失败的责任者；民众对地方政府和政策可以公开批评，又对中央政府的良善治理保持期待。多重合力，制约了整个体制的内在紧张。然而，这种策略性的调适在国家未来的治理中仍有很多的障碍要克服。

附表：回归分析中的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问卷题目及编码方式	均值	标准差
家乡所在地	“你的家乡(入学前常住地)位于_____省/直辖市/自治区”，中西部省份(黑龙江、吉林、河南、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陕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编码为“1”，东部省份为“0”。	0.53	0.499
户籍	选择“农村”编码为“1”，“城镇”为“0”。	0.40	0.489
性别	选择“男”编码为“1”，“女”为“0”。	0.59	0.493
专业	根据实际填答进行分类，人文社科类专业编码为“1”，理工医农类为“0”。	0.30	0.460

① 多项研究表明：上访者在央地政府间做出明显区隔的同时，还赋予政府的办事能力与服务态度以不同的信任度，并把中央政府本身看作一个自低到高，由国务院各部委办、一府两院、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组成的层级结构(Li, 2004; 2008; forthcoming); 民众对党委、政府(指行政系统)、法院等机构的政治信任也不尽相同(如 Wang, 2005; Yang & Tang, 2010; 肖唐镖、王欣, 2010)。把这些因素叠加，就形成了一个层层嵌套、环环相扣、极为复杂的广义上的“差序政府信任模式”。每两层之间的信任差异都有助于保持对中央枢纽和执政者的幻想、扩展缓冲地带、构筑“防洪”堤坝，从而把“硬核”层层包裹起来，提高了“保护带”的效力和持久性。

(续表)

变量名称	问卷题目及编码方式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经济	“你家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属于:”, 选择“很好”或“较好”编码为“1”, “较困难”或“很困难”为“0”。	0.62	0.485
生活改善	“你家的生活状况在过去八年内:”, 选择“有所改善”编码为“1”, “维持不变”或“有所下降”为“0”。	0.76	0.430
社会信任	“你是否同意以下说法: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值得信赖的”, 选择“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编码为“1”, “比较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为“0”。	0.68	0.468
政治新闻关注	“你平常关注政治新闻吗?” 选择“经常关注”或“有时关注”编码为“1”, “很少关注”或“从不关注”为“0”。	0.84	0.366
网络新闻关注	“对网上那些有关政治的评论或帖子, 你是否经常浏览, 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选择“经常浏览, 也参与讨论”“经常浏览, 偶尔会参与讨论”或“经常浏览, 但并不发表看法”编码为“1”, “很少浏览, 从不参与讨论”为“0”。	0.53	0.499
不公正对待	“你或者你的家人是否曾经受到过政府的不公正对待?” 选择“有”编码为“1”, “没有”为“0”。	0.22	0.416
制度满意	“总体而言, 你对中国的整套政治制度设计:”, 选择“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编码为“1”, “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为“0”。	0.79	0.408
民主满意	“总体而言, 你对民主在中国的实行情况:”, 选择“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编码为“1”, “比较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为“0”。	0.57	0.496
基层政府接触	“你或者你的家人接触过家乡的市级、区县级或乡镇级政府机构吗?” 选择“经常接触”编码为“2”, “接触过, 但很有限”为“1”, “没有接触”为“0”。回归分析中参照变量为“没有接触”。	1.01	0.563
高层政府接触	“你或者你的家人接触过中央或省级政府机构吗?” 选择“经常接触”编码为“2”, “接触过, 但很有限”为“1”, “没有接触”为“0”。回归分析中参照变量为“没有接触”。	0.19	0.441

(续表)

变量名称	问卷题目及编码方式	均值	标准差
入党意愿	“政治面貌:”, 选择“党员(含预备)”或“非党员, 但有入党意愿”编码为“1”, “非党员, 且无入党意愿”为“0”。	0.81	0.396
国家自豪	“你是否同意以下说法: 我为自己是公民而自豪”, 选择“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编码为“1”, “不太同意”或“非常不同意”为“0”。	0.94	0.242
政治效能	“如果你了解家乡市长/县长每天的大致工作内容, 你能否判断他干得好不好?” 选择“肯定能”或“也许能”编码为“1”, “不太能”或“肯定不能”为“0”。	0.70	0.457
政治恐惧	“如果在学校或其他公共场合批评了政府, 你是否会担心被人举报?” 选择“很担心”或“有点担心”编码为“1”, “不太担心”为“0”。	0.51	0.500
信任差	“你对家乡所在地(入学前常住地)中央/省级/市级/区县/乡镇(街道办事处)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 选择“非常不信任”编码为“1”, “比较不信任”为“2”, “一般”为“3”, “比较信任”为“4”, “非常信任”为“5”。“信任差”即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减去其对四级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均值。	0.90	0.790
平均信任	受访者对五级政府的信任度均值。	3.45	0.669
中央信任	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大于3(即选择“非常信任”或“比较信任”)时编码为“1”, 反之为“0”。	0.86	0.343
地方信任	受访者对四级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均值大于3时, 编码为“1”, 反之为“0”。	0.59	0.492

注: N = 895, 按列排除缺失值。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参考文献

- 曹正汉(2011).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 社会学研究, 1.
- 胡荣(2007).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 社会学研究, 3.
- 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社会学研究, 1.
- 景跃进(2000). 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焦点访谈》的实践与新闻改革的思考. 开放时

代, 5.

康晓光(2004). 仁政: 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 战略与管理, 2.

李连江(2012). 差序政府信任. (香港)二十一世纪, 六月号.

零点指标数据网(2008). 基层政府亲民根基要更牢. 参见: [http://www.horizonkey.com/c/cn/news/2008-01/23/news\\_697.html](http://www.horizonkey.com/c/cn/news/2008-01/23/news_697.html).

刘晖(2007). 政府绩效对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作用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比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墨宁(2004). 周凤华译. 当代中国研究中的问卷调查研究: 从地方样本中学习.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

荣敬本、崔之元、王拴正等(1998).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 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沈荣华(2007). 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分工.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王汉生、王一鸽(2009). 目标管理责任制: 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 社会学研究, 2.

吴国光、郑永年(1995). 论中央—地方关系: 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肖唐镖(2005). 中国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 秋季号.

肖唐镖、王欣(2010). 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 管理世界, 9.

熊美娟(2010).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公共行政评论, 6.

杨善华、苏红(2002). 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 社会学研究, 1.

叶敏、彭妍(2010).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3.

应星(2001).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 北京: 三联书店.

应星(2011). “气”与抗争政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于建嵘(2010). 抗争性政治: 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张厚安、蒙桂兰(1993). 完善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制度 推进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湖北

- 省广水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调查. 社会主义研究, 4.
- 赵树凯 (2003). 乡村治理: 组织和冲突. 战略与管理, 6.
- 周黎安 (2008).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与治理.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雪光 (2008). 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 社会学研究, 6.
- 朱光磊、张志红 (2005). “职责同构”批判.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 Cai, Y. (2008). 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3): 411-432.
- Chang, Y. & Chu, Y. (2008). How Citizens View Taiwan's New Democracy. In Chu, Y., Diamond, L., Nathan, A. J. & Shin, D. C.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 (2004).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X. & Shi, T. (2001).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East Asia*, 19(3): 84-118.
- Cole, R. L. & Kincaid, J. (2000).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ederalism: Perspectives on Taxes, Spending and Trust. *Publius: Journal of Federalism*, 30(1-2): 189-201.
- Diamant, N. J. (2001). Making Love “Legible” in China: Politic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nforcement of Civil Marriage Registration, 1950—1966. *Politics & Society*, 29(3): 447-480.
- Diamond, L. (1989). Introduction: Persistence, Erosion, Breakdown and Renewal. In Diamond, L., Linz, J. J. & Lipset, S. M.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Easton, D. (1965).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 Edin, M. (2003). State Capacity and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 CCP Cadre Ma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 *China Quarterly*, 173: 35-52.
- Frederickson, H. G. (1997). *The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Publishers.
- Gilley, B. (2008).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3): 259-284.

- Guterbock, T. M. & London, B. (1983). Race,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Four Competing The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4): 439 – 453.
- Guo, X. (2001). Land Expropriation and Rural Conflict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166: 422 – 439.
- Hetherington, M. J. (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 791 – 808.
- Hibbing, J. R. & Theiss – Morse, E. (2002). *Stealth Democracy: Americans' Beliefs about How Government Should Wor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cy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nnedy, J. J. (2009). Maintaining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 Controlled Media. *Political Studies*, 57(3): 517 – 536.
- Lakatos, I.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New York: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Lei, Y. (201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Politic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Netize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8(3): 291 – 322.
- Levi, M. & Stoker, L. (2000). 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475 – 507.
- Li, L. (2004).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2): 228 – 258.
- Li, L. (2008). Political Trust and Petitioning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Comparative Politics*, 40(2): 209 – 226.
- Li, L. (forthcoming). The Magnitude and Resilience of Trust in the Center. *Modern China*.
- Manion, M. (2010). A Survey of Survey Research on Chinese Politics: What have We learned? In Carlson, A., Gallagher, M. E., Lieberthal, K. & Manion, M. Ed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gdal, J. S. (1994). The State in Society: An Approach to Struggles for Domination. In Migdal, J. S., Kohli, A. & Shue, V.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shler, W. & Rose, R. (1997). Trust, Distrust and Skepticism: 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 – Commun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s*, 59(2): 418 – 451.

Mishler, W. & Rose, R. (2001).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 – 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1): 30 – 62.

Nathan, A. J.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6 – 17.

Nilson, D. C. & Nilson, L. B. (1980). Trust in Elites and Protest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Political Behavior*, 2(4): 385 – 404.

Norris, P. (1999). 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 In Norris, P.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ye, J. S. (1997). Introduction: The Decline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In Nye, J. S., Zelikow, P. D. & King, D. C.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Brien, K. J. (1996).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1): 31 – 55.

O'Brien, K. J. & Li, L. (1999).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31(2): 167 – 186.

O'Brien, K. J. & Li, L.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ige, J. M. (1971).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Rio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5): 810 – 820.

Perry, E. J. (1994).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 – Society Relations. *China Quarterly*, 139: 704 – 713.

Pew Research Center (1998). *Deconstructing Distrust: How Americans View Government*.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95.pdf>.

Pew Research Center (2010). *Distrust, Discontent, Anger and Partisan Rancor: The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606.pdf>.

Saich, T. (2007).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Governance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2(1): 1 – 28.

- Saich, T. (2011). Citizens' Perception of Adequate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Levels among Rural and Urban Chinese. In Zhang, E. , Kleinman, A. & Tu, W. Eds. *Governance of Life in Chinese Moral Experience: The Quest for an Adequate Life*. Abing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chubert, G. (2008). One - Party Rule and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Setting up a New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7 (54): 191 - 204.
- Shi, F. & Cai, Y. (2006). Disaggregating the State: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186: 314 - 332.
- Shi, T.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4): 401 - 419.
- Shi, T. (2008).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Chu, Y. , Diamond, L. , Nathan A. J. & Shin, D. C.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ockmann, D. & Gallagher, M. E. (2011). Remote Control: How the Media Sustain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4(4): 436 - 467.
- Tang, W. (2005).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ng, Y. (2011). Morality, Benevolence, and Responsibility: Regime Legitimacy in China from Past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2): 141 - 159.
- Wang, Z. (2005).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Forms and Causes. In White, L. Ed. *Legitimacy: Ambiguities of Political Success or Failu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ress.
- Yang, Q. & Tang, W. (2010).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formance? *Asian Politics & Policy*, 2(3): 415 - 436.